

共赏百本好书

- 建设“书香重庆”
- 打造书香之城
- 提升城市品位

渝版书架

普通人的生命小传

——贺彬小说集《乐园》三人谈



刘建东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记忆中,最令人感怀的是作者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可以说,贺彬的小说,不是颂歌,也不是挽歌,而是记录,是普通人的生命小传。小说质地坚硬,仿佛总有一双文字之外的眼睛,以犀利的目光,紧盯着小说里的芸芸众生,就像是阳光,能穿越时光与文字的丛林,抵达每一处角落,抵达心灵深处。

城市、记忆、爱情,构成了贺彬小说的三原色。它们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汇成了属于作家自己的文学的河流,在这条明暗互现的河流之上,漂荡着冷静与犹疑、追寻与徘徊。作家的追忆是建立在城市的时代之影中,而城市的身影又折射到人物的丰富内心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正是因为作家对于时代细微之处的敏感、对于人心深处末梢神经的敏感,作家记忆中的城市焕发出了人性的光辉,而作家精神的成长,回荡在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身上,使每一个人物都从细密的叙述之中,呼啸而来,撞击着我们本已疲惫的心灵。

这个时期,所谓的作家、诗人名字其实没啥意义,关键在于,他们不是真正的写作者,是不是耐得住寂寞的人。假如一个作家习惯于各种各样的霓虹灯、聚光灯下的常客时,他的写作死期就近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作为几十年的朋友和同事,贺彬不是这样的人,他沉浸在自己的文学世界,持续严肃地抵达。

何房子 (著名诗人、作家)

《乐园》里的故事铺设在我们熟悉的时光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这个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些记忆已经像老照片,有台灯照在书上的晕染。这些匆匆而过的时光还没有来得及凝视,我们就已经两鬓斑白。幸好,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无数次地抵达。

我感觉到,在《乐园》里,一个带着泪光的重庆,正微微转过身来。作者是一个温柔的人,在《乐园》里,他乐此不疲地使用长句子,如同要把一生的疼痛用口琴吹奏。他在叹息着自己,也在叹息着他们。

听命运的口琴来吹奏

——读小说集《乐园》有感

宋尾

我认识贺斌比贺彬更早。很长时间我们在同一栋大楼里面——较场口大元广场85号。这个地址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漫长的经历。这是重庆的报业大厦,我在8楼,12楼和20楼都待过,包括跑了两年的7楼照排室;而他一直在6楼。这似乎说明,我要比他更复杂和纷乱,他比我稳定和单纯。我们悬空在同一处,从没交集。直到有天,我翻开一期《红岩》杂志,看到一篇叫作《水塔》的小说,像触电一样,汗水就沁出来。迄今我还记得那篇小说,包括小说中那种潮湿、巨测的氛围。我使劲地、反复盯着那个早就知道的名字:贺斌。心里充盈着嫉妒、满足,还有一种无端的兴奋,想马上上楼去找他。不过,一年多后我们才有了第一次见面,当时我供职的媒体和界限网共同组织一次本土小说作家聚会,印象中,那是重庆青年小说作家的初次聚会,甚至不记得那晚到底聊了什么,但气氛出奇热烈,大家都有一种抛出暗号得到回应的感觉。那晚以后,我们结下了绵久、牢固而真挚的友谊。现在,媒体人贺斌成了小说家贺彬,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乐园》,似乎来得有点晚,但晚饭总比早饭更值得期待和品尝,不是吗?

首先,这是贺彬写作多年的一个成果,囊括了他创作生涯非常重要的6部中篇小说。同名篇章《乐园》,首发于《人民文学》杂志;《淹没》在刊发后获《山花》文学双年奖中篇小说奖,获奖词里说“试图将人与人、人与城、人与时代的缭绕关系梳理清楚,从‘淹没’中找到一线‘光照’”;《口琴》则被《天南》杂志青睐,刊发在创刊号上,引起大量读者注意;《啊,朋友再见》曾被《小说选刊》刊载,责编稿签这样评价:作者以离合之悲写流徙之感,沉郁的笔致之下,寄寓着一代人的怕与爱。真实、饱满,且有温度。实际上,这段话也正是贺彬这本小说集的特质和底色。

于,这部集子广泛展示了小说写作技术和方式。熟悉作者的朋友都知道,贺彬阅读量极大,他最为钟情和崇敬的,是类似于《静静的顿河》式的大河小说。所以他有颗文学的“正典之心”,确乎是真实的。他的写作显然受到这种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他总用全知视角切入合围构建故事的原因。但他并不守旧,不拘于传统,从各种类型小说当中汲取和学习。他的故事很少一板一眼,往往别致、机巧。比如《口琴》,算是他早期的作品,放在现在依旧不显过时,原因在于讲述的方式。他在叙述中将整个故事打乱,又在每一章节用一个关键词作为引领。既保留线性的故事结构,但又并非一竿子插到底的模式,让一个其实并不复杂的情感故事,产生了繁复的内蕴。并且,“口琴”作为贯穿故事的一个重要道具和隐喻,设置得十分精妙——必须读到最后一句才会感受到。将一口气一直压到最后一行才徐徐吐出,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功力。事实上,贺彬小说中比较鲜明的特征就是他的结构能力。中篇小说,可以说最为关键的一项就是结构,没有合适的结构,就像在船上建房。作者很少按部就班讲故事,比如这部集子里的《淹没》,将视角依次限定在具体的人物身上,让故事随之游离、飘荡,却始终被一只无形的锚暗牵引。他的故事构建总是充满了设计感。

当然,对更广大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也是合适的。相比短篇,中篇在故事性上更完整、沉浸度更高,获得感更强。从趣味和本性,作者更喜欢并擅长写作中篇。我常说他是天生的中篇小说选手,因他的故事往往并不从一个切口进来,总是挟裹着深刻的背景朝着一个广阔的空间强突,这就决定了他的故事,总有一种开阔中撕扯的悲欢。就在我看来,这部集子里每篇小说,不论从氛围、情绪、气味、图像、人物、色彩、环境等等,都像他独立导演的艺术电影。同时,作者也是狂热的艺术电影爱好者,他的小说往往凝练着严肃文学的纯度,但并不排斥在小小说里寻求一种更广阔的共鸣——依托流畅的叙事和情节,最大程度地通往读者。

那么“乐园”是什么呢?读完我想,可能就是当我们曾不经意拥有又在步履中被舍弃、但在跋涉很远之后回望才会惊觉是一种奇观的东西。它大概就是一种深情,就是“往昔”本身——一种对过往的重新和挽留。“往昔”里面,原本就包含了我们的命运,在故事尚未抵达之前,命运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暗示。我觉得,《乐园》就是故事里的那只口琴,它真挚地吹奏了这样一些故事。



电子书、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书评投稿邮箱:qrbdsb@163.com

深情书写脚下大地

川渝作家这样回应乡村振兴

为背景进行创作的作品日益增多,一批乡土文学佳作相继涌现,引发众多关注。

今年8月揭晓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便是重要证明。“5部获奖作品中,杨志军的《雪山大地》是对草原牧区的深情书写,乔叶的《宝水》勾勒出太行山远村的嬗变,这两部可视为新乡土文学的代表。凭借《本巴》获奖的刘亮程,也被认为是继沈从文、汪曾祺之后新乡土文学代表作家之一。”樊星说。

若将考察视野放到川渝地区,乡土文学创作也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樊星说,川渝地区历来是乡土文学重镇,这一传统从现代文学大师李劫人、沙汀、艾芜等延续至今。1979年,重庆《红岩》杂志发表简阳农民作家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荣获首届茅奖,开启了新乡土文学的先河。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川渝乡土文学又生发出不一样的风景:谭建兰的《瓦屋村》、罗伟章的《下庄村的道路》和《尘世三部曲》、杜阳林的《惊蛰》、张者的《拯救故乡老家庄》、李明春的《川乡传》、韦永胜的《坪坝花开》……川渝作家群笔下,新乡土文学佳作不断涌现,他们的创作实践,为中国文学提供了独具特色的川渝乡土文学样本。

视角多元
多角度折射新时代山乡巨变

“广袤乡村有丰富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和文化之美,它们构成了乡土文学的审美资源宝库,不断塑造着乡土文学的审美旨趣。”中国作协副主席吴义勤认为,始于鲁迅的现代中国乡土文学书写,乡土始终是文学的重要母题与意象,是一代代作家不断诠释和艺术化演绎的对象。新时代的乡土有怎样的内涵、形态与风貌,如何挖掘、书写与表现?这是对当下作家深入生活能力和审美发现眼光的考验。

在川渝作家笔下,乡土文学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展现出多元的视角,从不同角度书写农民脱贫致富、农村旧貌换新颜,讲述富有时代特色的乡村故事、乡人故事,从不同角度折射着山乡巨变——

罗伟章的创作被公认“坚实、沉稳、接地气、有温度”,他用报告文学《下庄村的道路》歌颂了重庆“当代愚公”毛相林。“‘当代’这概念非常重要,因为他修路之后要致富,致富要讲科学,不能再凭力气蛮干,他要种植经济作物,要请科研工作者考察,这些都是当代乡村的新变化。”不过,在小说《尘世三部曲》中,尽管罗伟章依然在讲述他熟悉的乡土世界,但他却强调,“我不觉得自己是在写乡土小说,我只是在写熟悉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写的人在时代中的命运以及如何化解命运。”

杜阳林的长篇小说《惊蛰》讲述了一个少年如何超越苦难拥抱未来,从乡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无论城乡都在时代巨轮之下滚滚向前,纵使命途不一样的道路,去往不一样的目的地,但都以‘实现人民生活的美好向往’为依归。因此,我以白描的方法贴近现实本身,贴近泥土去书写乡土故事,通过真正关注乡土群体,去探究人性背后的复杂幽微,追寻时代变迁与个体命运的走向。”

长篇小说《川乡传》中,李明春以在川东基层乡村生活40多年的命运为主线,展示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变迁画卷,揭示了农民曾经困惑、矛盾、挣扎、奋斗的精神史和奋斗史,被认为是反映中国乡村振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的标杆之作。“我长期在农村工作,我基本上是本色书写,所写的都亲历过。”他坦言,书写新时代乡土对每位作家都是考验,“切记不能脱离

生活,脱离读者。”

书写新时代乡土故事,不仅吸引着越来越多作家,也吸引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参与者,比如开篇提到的谭建兰,初中毕业的她写《瓦屋村》耗时5年,被认为写出了带着“泥土味道”的“活化石”作品。“目标很单纯,就是想记录下自己看到的乡村变化,记录是初衷,文学价值则是意外收获。”她由衷地说。

再如报告文学《坪坝花开》作者韦永胜,他是脱贫攻坚期间派驻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坪坝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这部报告文学凝结了他下村三年的点点滴滴,“书里有我初到坪坝村时的所见所闻,记录了当时坪坝村的贫困现状、脱贫攻坚历程,记录了我扶贫以来的思考和感悟。”

真诚书写
聚焦乡村新貌创作时代精品

新时代以来,随着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的全面展开,中华大地上正发生着新的山乡巨变。书写新的山乡巨变,是新时代呼唤。优秀的作品能让人读到最深切的乡情乡愁,感受到百年乡土中国的巨变与生机,激发出为乡村振兴持续奋斗的精神动力。

在杜阳林看来,唯有真诚,才能成就精品,“乡村振兴是摆在作家面前的重大课题,今天的乡土文学应该贴近现实本身,真诚地如实反映乡村振兴这一过程,也许其中有血泪斑驳的创痛,有难以言喻的悲伤,但我们不应该回避,而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和挫败,更好地总结经验,才能真正写出打动人心,引发共鸣的时代精品。”

罗伟章注意到,当代乡土文学作品中,“不少是俯视性的,介入性的,甚至是强力介入”,这就很难“渗透到乡土的内部,观察时代变迁中的离合悲欢”。“乡土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尤其是审美性,呼唤着我们表达对大地的痴迷和爱。因此,作家在心里不要设定限制,越是真诚地打开自己,笔力就越宏远。”

作家满怀真诚和热情书写乡土,用笔记录新山乡巨变,这个过程中,新时代乡土文学走向何方?如何回应时代之问?这是新时代乡土文学能否保持活力、再续辉煌的关键。市作协负责人表示,只有聚焦新时代中国天翻地覆的史诗性变革,充分展示新时代农村的伟大实践和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面貌,才能塑造出有血有肉的时代新人典型,为人民捧出带着露珠、散发泥土芳香的新时代文学精品。

2022年夏天,中国作协推出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这一国家级文学行动,就是要号召所有文学写作者共同拥抱新时代、书写新山乡。”吴义勤说。重庆也在积极行动响应该计划,“我们实施‘讴歌计划’,大力引导组织作家融入山乡采风创作,建立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选题库,对相关创作动态管理,并组织专家审稿,向中国作协推荐佳作。《红岩》杂志社与作家出版社还签订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名利拓展计划合作协议,切实助力重庆作家创作。”市作协负责人表示,只有聚焦新时代中国天翻地覆的史诗性变革,充分展示新时代农村的伟大实践和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面貌,才能塑造出有血有肉的时代新人典型,为人民捧出带着露珠、散发泥土芳香的新时代文学精品。

□本报记者 赵欣

“山在唱歌,水在呼应,花在绽放,树在起舞……一幅乡村振兴的有声画卷在瓦屋村徐徐展开。”伴随这样一幅画卷,36万字的长篇小说《瓦屋村》戛然而止,却有绕梁余音,唤起人们对未来的憧憬。

瓦屋村,渝东南一个国家级贫困村的贫困村。《瓦屋村》的故事正生于此。这部已入选首届“乡村振兴好书推荐”百种图书的长篇小说,由我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农民企业家谭建兰完成。“我文化程度不高,但有幸参与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体会颇深,我想记录下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进程。”她对重庆日报记者说。

作为一个具有深厚乡土传统的大国,新时代的重庆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乡土文学关联着乡土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见证着社会生活的沧桑巨变。包括《瓦屋村》在内,近年来川渝地区涌现出一批新时代乡土文学佳作。它们描写现代乡土中国,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构筑起一道别样风景。

大美画卷
新时代乡土文学佳作频出

2022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之年,2023年也是“精准扶贫”理念提出十周年。众多作家面对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用文学之笔记录、书写、讴歌新时代,已有多部佳作问世。

“中华大地上正发生着的山乡巨变,为乡土文学提供了空前丰厚的土壤,也为乡土文学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提供了新经验。”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樊星注意到,近年来,中国文坛以新时代乡土

